**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看中国当今的劳动力价格**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 孔柳絮

学号：1300015506 序号：155

摘要：当今中国劳动力价格整体上涨，尤以农民工工资上涨最具代表性。本文将利用马克思相关经济学理论做出分析，并用经济学供求理论进行检验。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劳动力价格 供求分析**

# 引言

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它又包括三个部分：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国内“民工荒”现象屡屡出现，劳动力价格不断走高；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输出的劳动力价格也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将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相关内容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情况，利用经济学知识作出分析，探究中国劳动力价格。

# 国内劳动力市场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定义，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而就业人员是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研究我国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为便于数据分析，本文所指的劳动力即采用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劳动力的价格则以劳动力工资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各产业劳动力需求旺盛，农村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以支持城市的高速工业化进程。下图分别为1978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活动总人口数目变化、1978年至2013年中国就业人员总数变化以及城乡就业人员数目变化：

图1 1978-2012年经济活动人口数变化

图2 1978-2013年就业人员数目变化

图3 1979-2013年城镇就业人员数目变化

图4 1978-2012年乡村就业人员数目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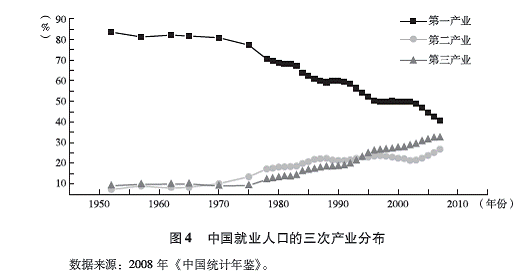


图5 1950年-2010年中国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分布

由前四幅图即可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活动总人口、就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反映出我国近几十年来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而乡村就业人员数从1978年到2000年同样处于上升趋势，2000年以后则慢慢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结果。从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分布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明显减少，第二、三产业君缓慢增加，且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产业分布的变化反映了各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进一步来说则是我国近年来产业结构改造、升级的结果。然而无论是经济总人口数、就业人员数、城镇就业人员数的持续增长、乡村就业人员的转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都是以我国总体经济形势的增长为基础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生产的增加一方面依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所以除去乡村劳动人员数，反映劳动力数变化的数据在近年来都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

图6 2000-201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变化

再来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0年以来也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乡村就业人员以及进城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最初以略低于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加的速度在增加。2006年开始,农村转移劳动力者的价格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镇劳动力价格增长速度，一些技术工人,甚至很多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城市白领的工资水平。调査显示，仅2005至2009年全国农民工工资就上涨了65%，年均涨幅达1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近年来,通过比较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以及城镇就业者、农民工内部受教育程度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看,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系统的工资趋同现象。最新的研究数据也证实了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的事实,农民工工资2006年增长了10%，2007和2008年增长有所放缓,2009年农民工工资的增速又超过了17%,这些证据与近期农民工工资的加速增长趋势相一致。[[1]](#footnote-2)

由以上可得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国内劳动力的价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即使以不变价格来计，实际工资也有明显增长。其中又以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农村迁移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最为明显。根据一项保守的统计，农民工工资04、05、06年分别提高了2．8％、6．5％、11．5％。

# 对外劳动力输出的情况

跨越国家间的人口流动是国际移民和国际经济的重要内容，其中劳动力人口的对外输出既是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方面。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不但要了解国内劳动市场的情况，也十分有必要清楚中国对外输出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以更好地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定位。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对外输出发展迅速，但规模依然较小。资料显示，当前国际上每年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超过3500万人，但中国在世界劳务市场的份额仅为1％左右，潜力巨大。另外，我国对外输出劳动力中，高级劳务人才比例较低，大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下岗工人，即非技术性人才，且外语水平较差。从国际比较来看．这种外派劳动力结构的失衡更加严重，比如在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我国所占市场份额仅为世界市场的1％。

我国对外输出劳动力的低技术含量性决定了其所从事的工作的低端性，进一步导致了工资的低水平。报道显示，大约90％的中国劳工在以色列从事建筑业，他们的月收入一般是750到1000美元，远远低于当地工人水平。美国出版的一份名为《中国视野》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的工资之低令人吃惊，受访中国厂商给予每名工人每月工资的中位数是121美元（超时工作除外），与美国厂商所给予每月2160美元的工资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尽管有美国移民法及劳工法案的限制，美国厂商依然十分愿意雇佣中国劳动力。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工人的“勤劳勇敢”与建筑经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工人的工资要比美国工人低，他们将住在活动房屋中，全天倒班工作，工程完工后他们将返回中国”。

由上述内容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对外输出劳动力的价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本土劳动力的价格，但又明显高于国内同种工人的工资。这一点可以用著名的比较优势定律来解释，在所有生产要素中，中国总量惊人的劳动力有着突出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过去拼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必然要发生改变。美国所罗门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分析师丹·汉纳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劳动力成本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伴之而生的，是大量劳动力的闲置。而在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对外籍劳务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这预示了中国对外输出劳务将会有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 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原因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作为特殊的商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包括三个部分：为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商品的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就是商品的价格，而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为其工资。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力的工资主要取决于：一、劳动者本身及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种类、数量与品质；二、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所需花费的费用。

以农村居民为例，1980年至2013年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变化如下：

图7 1980年-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

很显然，1981年至1993年，人均消费支出增加较为缓慢，主要在于当时生产水平低下，商品种类少，人们消费能力有限；1994年开始，人均消费支出处于平稳增长状态。虽然人均消费支出不能完全代表农村居民在必需的生活资料上的支出，但是考虑到农村居民消费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意义。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消费特点不同，其消费主要集中在必需的生活资料上，而不像城市居民有相当比重用于娱乐、精神消费。另一方面，无论是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还是迁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其消费水平大致相当。所以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也反映了农村劳动者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生活资料费用的增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能力快速提高，人们面临的消费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广。相应地，劳动者本身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种类、数量、品质都有所增加、改善，最典型的例子即是“三大件”的变迁。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目的在于提高生活水平，所以其工资首先要满足其生存需要。在劳动者必需生活资料花费增加的基础上，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也随之不断增加，那么劳动者的最终工资也必然会增加，其最终增加的幅度则取决于行业特点、工资制度以及当时通胀率等条件。

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劳动者接受培训的花费，培训的目的在于使得劳动者具备所要从事工作要求的能力，那么这项花费即可转化为劳动者受教育的花费，间接转化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即，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技术水平也相对越高，可视作其接受培训的花费越高。

关于以上结论可以由以下数据进行说明。在各个行业受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数比重中，初中教育水平占50%左右的有：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八种行业的技术含量低，消耗体力多，相应地为工作而花费的培训费也低。反过来看，大学本科以上教育水平占到20%左右的行业有：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软件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六种行业。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业等。很显然，在本科以上教育水平、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占比较高的行业均为尖端技术和科研领域集中的行业，这些行业对从业人员技术性要求高，其受教育水平即能反映出其技术培训花费也很高。由此可以得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与劳动者接受培训所需的花费之间大致存在可替代性。

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反映着人力资本的条件好坏。从1997年至2011年的教育经费投入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日增加速度逐渐加快，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可见一斑。据2007年及200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6岁以上中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小学和初中文化教育程度为主，大专以上教育水平和未上过学的较少。其中2006年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数仅占6.22%，2008年这一比例提升至6.7%，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初中水平，2006和2008年末分别为38.99%和40.93%。[[2]](#footnote-3)更有数据显示，2010年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中，初中学历者占48.8%，小学学历者约占23.9%，高中与专科学历者约占24.6%，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4.1%。这一系列数据均表明21世纪初期中国教育由小学教育普及阶段转向了初中及高中阶段，教育水平得到了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可以预见到，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必然也会随之明显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能够胜任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进而能够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应地，劳动者将合理地要求更高的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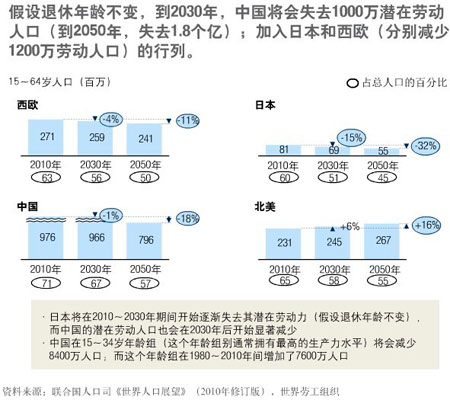
图8 1997-2011年教育经费

以上分析说明，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完全合理的，是与劳动力必需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培训花费增加的现实情况一致的。

# 从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价格变化趋势

根据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我们可以判断，在当今生活资料花费、培训花费都日益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会上涨。本文也将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简要分析劳动力价格变化趋势。

1. 供给减少为主趋势



由上图可看出，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预计，中国的潜在劳动力人口在2030年后开始显著减少。事实上，2004年开始沿海在东南地区小范围出现而后逐渐波及到全国的“民工荒”已经预示着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开始出现并影响生产的需要。人力资源保障部收集的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市场中岗位空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在0.9以上，虽然在2008-2009年有所回落，但2010年开始回升，并始终保持高于1的水平，充分体现了劳动供给的不足。

1.1持续低生育率

受持续低生育率影响，我国人口总量增长逐渐放慢了脚步，虽然学界对于人口高峰到来时间的判断不一，却对我国人口总量将于21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入负增长时期基本达成一致。然而，在这一人口规模从扩张到收缩的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先于总人口停止增长。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会在1982~2050 年期间率先经历一个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过程。1982~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快速增长期，总量将由1982年的6251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99938万 人，年均增加1385.96万人，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快速上升趋势， 由1978年的61.5%增加到2010年的74.53%。在否定了学界对 “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8左右”的观点后，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版》中动态调低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认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64左右，2015~2020年会进一步下降至1.51。 修正后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在这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将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时期：预计将以每年238万人的速度在2015~2035年期间首先度过一个相对平稳的人口规模减少期。由此可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成为必然趋势，而这也直接决定了劳动力供给在数量上减少的必然性。[[3]](#footnote-4)

1.2老龄化现象严重

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也即是说，中国的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大大受到限制，抚养比较高。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

在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基础的生育率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下，2012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出现下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稳步下滑的态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进一步减少，总体劳动力供给不足局面将逐步显现，并推动劳动力成本继续加快上升，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步入尾声。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分布特点在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也会使得不同年龄劳动力供给出现明显分化趋势。其中，15-34岁的年青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主要部分，其规模将在未来的10多年时间内从目前的4.2亿下降至2026年的3.2亿左右；与之相反，受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推动，35-59岁的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则将从目前的5.2亿增加至5.7亿左右。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化加剧将在劳动力市场引发更多结构性矛盾。

1.3就业参与率总体趋于下降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除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外，还包括劳动参与率。长期以来，我国都属于全球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不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网络日益完备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正处于逐年下滑的状态。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80.4%，在有统计数据的183个国家或地区中处第23位。不过，数据也显示，自1992年至今，我国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了4.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2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约为10亿人，劳动参与率下降意味着平均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大背景下，如果未来劳动参与率继续维持下降势头，将加剧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紧张局面。

1.4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一直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为城镇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36亿人，其中86.1%为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季度末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较上年同期增长525万人，增长3.1%。在劳动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保持增长势头为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做出重要贡献。

不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面临着潜力日趋枯竭的问题。以最受劳动力市场欢迎的青年劳动力为例，《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表明流动劳动年龄人口中“80后”所占的比重为48.3%，目前15-31岁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约有9814万人左右。2011年，我国农村人口有65656万人，其中15-31岁人口比重为27.15%，大约17825万人，其中流动农民工占比达到55%左右，如果刨除仍接受教育、残疾等无法工作的人口，“80后”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占该年龄段农村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到65%左右，未来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大。

1. 需求仍未减少

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但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会因此减少，可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来分析。

美国劳动力统计局2005年8月出版了Judith Banister撰写的月度劳动评论，认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步伐迅速加快(从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对比之前五年平均只有216%的升幅)，但中国工资升势增速对于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丝毫起不到作用。中国2002年总体制造业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只有0157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每小时2114美元的3%，或相当于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新兴工业经济体（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10%、或仅仅为日本和欧洲标准的3%。“中国仍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它国家的优势”。把Banister女士的结论延伸至2005年，中国工人每小时工资仍然是相当于美国工人的3%，两国间的巨大工资差距丝毫没有缩窄。[[4]](#footnote-5)这些数据说明，尽管中国对外输出劳动力的工资在以客观速度增加，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与同类劳动力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对外输出时有较好的教义基础，交易摩擦成本低，优势明显。所以总的来说，国际劳动力市场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仍是旺盛的。  
 国内来看，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二、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劳动力需求仍较大，以弥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另外，产业结构改造的一大效应就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将逐步排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劳动生产率上看，1996~2011年问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8%，领先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年均增长的8.7%，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幅度较大。因此，如果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解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因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而受到更大的影响。数据也显示，近年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也大大增加。[[5]](#footnote-6)

从以上分析看出，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呈现减少趋势，而国内外劳动力需求暂时不会减少甚至有增加可能，所以由供求定理得出，劳动力价格必然上升，与由马克思经济理论得出的结论一致。

#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

【2】杜建军 刘博敏：《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趋同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效应》，原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14年第七期。

【3】刘辉 霍小平 段汉明：《中国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研究》，《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第13卷第2期。

【4】王欢 黄健元 王薇：《人口结构转变、 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2期。

【5】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王炜 孙蚌珠：《劳动力需求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96-2011年的数据》，《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3期。

【7】蔡昉：《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年3月11日。

【8】蔡昉：《“民工荒”现象：成因及政策涵义分析》，《开放导报》2010年第2期。

1. 杜建军 刘博敏：《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趋同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效应》，原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14年第七期。 [↑](#footnote-ref-2)
2. 刘辉 霍小平 段汉明《中国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研究》，原载于《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第13卷第2期。 [↑](#footnote-ref-3)
3. 王欢 黄健元 王薇：《人口结构转变、 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原载于《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2期。 [↑](#footnote-ref-4)
4. 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footnote-ref-5)
5. 王炜 孙蚌珠：《劳动力需求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96-2011年的数据》，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3期。 [↑](#footnote-ref-6)